

《白雨斋词话》百年研究及论文录述

陈 昌

《白雨斋词话》著作者陈廷焯（1853—1892），原名世焜，字耀先，一字亦峰，又字伯与。生于咸丰三年（1853），丹徒人，后迁居泰州。光绪戊子（1888）年举人，晚清词学评论家、诗词学理论家、词史学家。

一、 陈廷焯的著作及《白雨斋词话》问世

陈廷焯的著作林立，生前均未付梓。至今除有部分稿本保存或付印外，遗失的不少。

（一）陈廷焯的著作

如今能知道的陈廷焯的著作，主要是从其著作《白雨斋词话》一书中获悉。书中记有《云韶集》，此集已由其长子陈兆琛和四子陈兆鼎受聘于南京国学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时，赠于该馆，现钤有国学图书馆朱泥方印，一直供后人查阅与研究。陈廷焯在其“词话”中曰：“余旧选《词则》四集，二十四卷，计词二千三百六十首，七易其稿而后成。”陈氏又称：“余窃不自揣，自唐迄今，择其尤雅者五百余阙，汇为一册，名曰大雅。”分六卷。大雅而外，他又选撰三集，取名“放歌集”、“别调集”和“闲情集”，每集均分六卷，并与“大雅集”合为一册。陈氏曰：“大雅为正，三集为副，总名之曰词则”。《白雨斋词话》和《词则》的手稿本，在极度动荡的情况下，历经沧桑，得由陈廷焯之四子陈兆鼎、三子陈兆鹏等先后悉心保管，才能保存至今，为学界所用。这两部著作的手稿本，现保存于陈氏孙辈处。陈氏在“词话”自序中云：“余选《希声集》六卷，所以存诗也”，《续丹徒县志》记载，陈廷焯著有《希声集》八卷。不论是六卷抑八卷，《希声集》至今未见，显然已经散失。陈氏以“一字亦峰丹徒耀先陈世焜选评”署名的《骚坛精选录》，目前尚存残本，仅存卷之七至卷之二十七，其中还有不少缺页或破损，无法知道该“精选录”的总卷数，也未能见到撰写年月，此诗评本现存于其孙辈处。陈氏在“词话”中记有与“吾邑马眉生”相会时的记述：“己卯（1879 年）秋，会于金陵（南京）旅次，畅论词学源流，并赠以旧录《唐宋词》一本”。马生平不详，此本至今未闻，必遭遗失。在“词话”自序中，陈氏云：“余拟辑古今《二十九家词选》二十卷”；又谓：“余久有《全唐选》之意，约得三千首，此举至今未果。”

这些均未成书，他的这些手稿或稿本，也已散失。陈廷焯著有《白雨斋词存》和《白雨斋诗钞》，但这两部著作的手稿本或身后未被选刊的诗词手稿，也均遭遗失。

（二）《白雨斋词话》和《白雨斋诗词存》问世

壬辰（1892）年，陈廷焯 40 岁时，不幸因病逝世，其父陈铁峰率陈廷焯的受业门人，整理其遗著。文献称：陈铁峰“持论精审，谦抑至再”，铁峰尊翁将《白雨斋词话》十卷手稿本，删节为八卷，由受业门人许正诗、许棠诗、王宗炎、甥包荣翰、族子陈凤章、从子陈兆煊等人校正。于光绪甲午（1894）年木刻成册；另从陈廷焯所著诗词中选词 46 阙，为《白雨斋词存》；由同里高寿昌评选，甥包荣翰校刊，又选诗 82 首，为《白雨斋诗钞》；合为《白雨斋诗词存》，也木刻成一册，附于《白雨斋词话》八卷木刻本后，一并刊行问世。

铁峰尊翁及廷焯的受业门人将《白雨斋词话》付梓发行之举，不仅使天壤孤本未遭湮没，而且得到传播与发扬，为丰富我国诗词文学宝库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意义重大而深远，可谓功垂后世。

二、《白雨斋词话》相继刊行和《词则》问世

《白雨斋词话》自十九世纪末发行后，绵延百余年，仍相继陆续刊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陈廷焯撰《词则》又影印出版。进入二十一世纪，“词话”和《词则》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弥足珍贵。

（一）《白雨斋词话》八卷本相继刊行

《白雨斋词话》继光绪木刻本之后，1927 年，苏州文新印刷公司出版《词话汇刊》，将《白雨斋词话》八卷本分为两册，每册刊登四卷发行。1929 年，上海文瑞楼书局、鸿章书局出版《评点白雨斋词话》石刻本，将“词话”八卷分为四册，每册刊印两卷发行。开明书店根据光绪木刻本校印，出版《白雨斋词话》八卷本，可惜此本在上海图书馆未借得纸质版本，只限于电脑屏上阅读，未查得出版年月，应也是早期的版本。1934 年，唐圭璋教授编《词话丛编》，其中辑印《白雨斋词话》八卷本。以上各版本虽起源于光绪木刻本，但仅刊印“词话”八卷全文，对木刻本附刻的《白雨斋诗词存》均未继续刊录发行。据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出版的《香港所藏古籍书目》报道：“香港中山图书馆亦著录‘清光绪二十年（1894）海宁许正诗等刻本’《白雨斋词话》八卷四册，应附有《词存》与《诗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9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采用开明书店版本作底本，用光绪

二十年木刻本校勘，出版“陈廷焯著《白雨斋词话》”八卷本，由杜维沫校点，在每个段落前，用中文数字注出段落数。所见的是该出版社“1983 年 9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出版的《白雨斋词话》八卷本。之后见到的是该出版社“2005 年 12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出版的“词话”八卷本。所有第 1、2 次印刷本，均未能见到。见到的版本都注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版本，所以版本的书面形式与内容均未见有何变动。此外，网上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又于 1962 年、1998 年和 2006 年出版《白雨斋词话》八卷本。

1981 年，唐圭璋教授将他 1934 年编印的《词话丛编》增加了内容，由中华书局 1986 年出版，其中刊载《白雨斋词话》八卷本和陈廷焯撰写于《云韶集》中的《词坛丛话》全文，并在“词话”与“丛话”每个段落的前行，按段落内容加载标题，并将此标题列为目录，便于读者了解内容，利于查阅。

本世纪的 2002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续修四库全书》，按光绪木刻本又刊印《白雨斋词话》八卷本发行。

网上披露：1954 年 3 月台湾开明书店出版了《白雨斋词话》，1960 年 10 月又出版“词话”第 2 版。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5 年出版的“传世藏书集库《文艺论评》”中刊有《白雨斋词话》。北京文艺出版社 2000 年出版的《词品》，也刊有陈廷焯著《白雨斋词话》。

此外，一些地方志、百科全书、辞海等，均刊载陈廷焯和《白雨斋词话》八卷本的条目。

（二）《白雨斋词话》十卷和《词则》影印本问世

《白雨斋词话》八卷本通行已久，广为流传。在八卷本的自序中，陈廷焯写明“萧斋岑寂，撰词话十卷。”这自然引起学界对“词话”是八卷抑十卷之讨论。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词话”八卷本的校点者杜维沫先生猜测：“这或许是原稿本为十卷，后经整理为八卷；也或许自序中的「十」字是误字。”又如文学批评、深于晚清词学的屈兴国教授认为：“词话”八卷“流布益广。然而，全豹未窥，学林每以为憾。”《白雨斋词话》是“八卷”抑“十卷”已成为学界的未揭之谜。

1978 年，“明清文学理论丛书”主编程千帆教授赴宁，见到南京大学屈兴国先生。屈有述作之志，就商于千帆教授，教授谓：“君既有志于此，则取陈、况（况周颐）之书注之，亦上不负作者之苦心，下有益于来学之佳事也”。屈则选陈廷焯著《白雨斋词话》进行校注。兴国先生先后赴沪、苏州、宁陈廷焯的嫡系孙辈之间，实地调研，从而在南京陈氏后人处，觅得保存至今的《白雨斋词话》十卷手稿本。屈曰：“大喜过望”；千帆教授则称兴国“暝写晨抄”。两年后，由程千帆教授作序，并提字“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为书名。1983 年，

由齐鲁书社首次出版《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十卷本^{〔1〕}，分上下两册。兴国先生在“词话”全文各段落的前行居中，用中文数字标明卷数和段落数。并在该书中介绍了陈廷焯撰《云韶集》，还将陈氏附于《云韶集》中的《词坛丛话》全文也印录于“足本校注”一书中。书中又首次披露陈氏撰写的《词则》，他称：“陈氏在编选《云韶集》之后，又撰《词则》一书。

《白雨斋词话》即其撰《词则》时所总结之理论。虽论词大旨，备见于‘词话’，然《词则》中所载作家作品评论，每更具体细致。二书固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还披露称：“至于《词则》本书，即将整理刊行。”在“足本校注”中，兴国先生又转载了陈廷焯于光绪甲申（1884）年仲春上浣（旬）为同里海陵（泰州）李子薪的《植庵集》所作的“植庵集序”全文、《续修四库全书白雨斋词话提要》、《续修四库全书白雨斋词存提要》以及有关县志刊登陈廷焯的生平史料等。又刊登了兴国先生研究陈廷焯著作《云韶集》和《白雨斋词话》的论文：“记陈廷焯《云韶集》稿本”、“从《云韶集》到《白雨斋词话》”、“《白雨斋词话》的‘沈郁’（同‘沉郁’）说”等。兴国先生在“文革”动乱刚过，学界对研究古诗词文学尚存芥蒂或惶恐未消之际研究《白雨斋词话》，他以执着的精神，深入实际，作实地调查，出版《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向学界说明《白雨斋词话》八卷与十卷之由来：“此书原为十卷，陈氏生前未刊。光绪二十年（1894）夏，始由其门人许正诗等整理，其父铁峰审定，删并成八卷，梓行问世。因持论精审，引起海内重视。”从此，首先揭示和澄清了学界长期对《白雨斋词话》为八卷抑十卷的揣摩。

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南京陈氏后人联系，将《白雨斋词话》十卷的手稿本与《词则》的手稿本，均以精装和简装两种影印本同时出版；《词则》又分上下两集影印问世。从此，《白雨斋词话》十卷手稿本的原貌完全面市，一扫学界对“词话”八卷抑十卷之悬惑。

2009年，广州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为《白雨斋词话》十卷本撰写“导读”^{〔2〕}，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导读”的《白雨斋词话》中，彭用红色小字夹注，在各个段落前，用红色方框及红体中文字表明段落数。彭在“导读”中，还介绍了陈廷焯的生平；述及陈廷焯的《白雨斋词存》与《白雨斋诗钞》两部著作；还将未付梓的陈廷焯的诗评本《骚坛精选录》作了首次披露。对经过陈铁峰尊翁审节付印的《白雨斋词话》八卷本，彭玉平教授在“导读”中称：其“内容更为紧凑，理论的周密性得以加强。所以，相形之下，八卷本的理论价值更为突出了。当然，从考察陈廷焯词学思想的原生态或丰富性的角度而言，十卷本的价值也不容忽视”。

《白雨斋词话》十卷本问世，之后的学者，探讨和研究陈廷焯诗词文学的学说理论和学

说思想，必然要取其十卷本的全貌进行研究，才说明研究材料之原始。所以，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林玫仪研究员在她的“陈廷焯《白雨斋词存》、《白雨斋诗钞》考论”^{〔3〕}一文中说：“在九十年代以前，学者所据以研究者均以刊行之八卷本；此后陈氏手稿由其后人捐出，为研究陈氏词学理论提供大批宝贵资料，研究方向遂有所创新。”她又称：“无法藉八卷本与《词则》重建陈氏理论之全貌。若非陈氏后人保存稿本，此等资料将永远流失”。

（三）《白雨斋词话》和《词则》入选“珍贵古籍名录”

将《白雨斋词话》与《词则》申报为“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后，历经各级评审委员会专家的评审，均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二〇〇九年六月十二日颁发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证书”。两份证书中分别载明：经国务院批准，《白雨斋词话十卷》（《词则四集二十四卷》）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编号 06588 和 06589）。特颁此证。

2010 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刊登了《白雨斋词话》与《词则》两部手稿本的图录。同年，江苏省文化厅和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编，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和凤凰出版社出版《江苏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也刊载了“词话”与《词则》手稿本的图录。

《白雨斋词话》手稿本还被遴选为 2009 年 6 月在北京举办的“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会”的展本。参展本的图录，由国家图书馆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册府撷英——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图录（二〇〇九）》。《册府撷英》前言称：“经典之作的稿本尤为难得，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十卷》……等书稿本，弥足珍贵”。

三、《白雨斋词话》研究论文录述

陈廷焯著《白雨斋词话》问世后，绵延百余年，不断为学界探讨与研究，推进了诗词文学的发展；丰富了诗词文学宝库；在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一）《白雨斋词话》的应用与研究

屈兴国^{〔1〕}和彭玉平^{〔2〕}教授均称：“光绪年间出版的《白雨斋词话》八卷木刻本问世后，词曲大师吴梅（瞿安）先生曾印作讲义，早岁（1917 年）教授于北京大学；其著作《词学通论》，名动一时，其中很多观点，多有采撷《白雨斋词话》。”1922 年，吴梅大师到南京东南大学讲授《词学通论》，也是传播陈廷焯的词学理论和词学思想。佛学大师赵朴初署，周汝昌、宛敏灏、唐圭璋等多名教授编撰，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 198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本《唐宋词鉴赏辞典——唐、五代、北宋》一书的扉页中，摘录陈廷焯“词话”中的箴言：“诗外有诗，方是好诗，词外有词，方是好词。古人意有所寓，发之诗词，非徒吟赏风月以自蔽惑也。”1934年，叶恭绰选编的《广篋中词》中云：“《白雨斋词话》极力提倡柔厚之旨，识解甚高，所作亦足相副⁽³⁾”而选录了陈廷焯词七阕。直到今天，有的作者，在选编出版历代诗词的编著中，在有关各首诗词后，还刊出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或《词则》中对该诗词所作的画龙点睛的评论。

《续修四库全书白雨斋词存提要》云：“廷焯与庄棫相切磋，故其词学深邃。”1982年，程千帆教授为“词话足本”作序谓：“夫亦峰论词，经涉广漠，读者每难尽悉其人其事其文。”1981年，西北大学袁睿正⁽⁴⁾先生在其论文“陈廷焯的‘沉郁’词说”中称：了解陈廷焯对“词境要求的内容和形式的特质，是正确认识和评价的途径。否则，即使费力再大，也是雾里观花，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对《白雨斋词话》经过一个认识与探讨的过程，研究者日增，研究论文频出，许多期刊如“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华文史论丛”、“中国韵文学刊”、“词学”、“中山人文学术论丛”、“中国文哲研究通讯”、“晚清词论研究”和有关大学学报等；很多编著，如《清代文学评论史》、《清代词学的建构》、《近代文学批评史》、《中国词学史》等；均刊有对《白雨斋词话》的词学评论、词学思想、诗词学理论以及词史学论等的讨论与研究论文。

屈兴国先生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一书中刊出了他研究陈廷焯著作的论文。彭玉平教授在不少期刊中载有他的论文，其内容在他的“《白雨斋词话》‘导读’”一书⁽²⁾中均有所反映。2010年出版的安徽省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孙维城⁽⁵⁾著《千年词史待平章》一书下篇“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研究”，是孙维城教授将他对陈廷焯其人及其著作《白雨斋词话》研究的有关论文，加以汇集和总结而形成的在职研究的封笔之作。

步入21世纪，武汉大学中文系陈水云⁽⁶⁾先生在其“《白雨斋词话》在二十世纪的回响”一文中，综述了二十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后期对《白雨斋词话》的讨论与研究。陈水云先生在文中指出：“从《白雨斋词话》在19世纪末刊行，经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吴梅在北京、南京两地的广泛传播，到八九十年代以后，《白雨斋词话》研究进入繁荣发展的20年，《白雨斋词话》的研究，整整经过了百年的发展历程。”水云先生指出：“从《白雨斋词话》的研究历程看，人们对《白雨斋词话》的认识是越来越深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研究观念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现代化，是不可忽视的两个重要因素，即人们将《白雨斋词话》置诸

学术研究视野，而不仅仅作为一种纯粹的创作或鉴赏理论。”陈水云先生总结说：“站在新世纪之初，回顾《白雨斋词话》的百年研究历程，我们对 20 世纪取得的成就怀有一种喜悦之感，同时也深感对《白雨斋词话》的研究任重而道远。……新世纪的研究者，在《白雨斋词话》领域将是大有作为的”。

（二）《白雨斋词话》的词学思想与理论核心

陈廷焯的词学思想和词学理论核心是“沉郁”说，这是陈廷焯在其创作实践中总结提炼出的对词学创作的一种标准，也是我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源头。词曲大师吴梅在甲戌涂月（1934 年夏历 12 月）为唐圭璋 1934 年辑印的《词话丛编》作序称：“白雨开沉郁之途，融斋严泾渭之辩。其余诸家，亦各有雅言。”1986 年再版的唐圭璋^{〔7〕}续编《词话丛编》，仍刊用 1934 年版的吴梅之序。吴梅大师在唐圭璋“丛编”所载的各家词话中，凸显了《白雨斋词话》及其理论核心。资深教授唐圭璋为《白雨斋词话》十卷影印本作序曰：“上下千年，尽收笔底，力纠朱彝尊《词综》‘备而不精’，张惠言《词选》‘精而不备’之偏，以温厚为体，沉郁为用，广开词域，阐述详瞻，为世所称。”寥寥数语，揭示出《白雨斋词话》的词学思想和理论核心；阐释了陈氏词学理论；衬托出陈氏千年词史学说。同年，唐圭璋教授在《词则》的后记中，更明确指出：“陈廷焯词学是崇风格、尚比兴、重寄托，提出沈郁两字为词旨，影响词学颇巨”。

1981 年，袁褔正^{〔4〕}在其论文“陈廷焯的‘沉郁’词说”中指出：陈廷焯著《白雨斋词话》“最突出的内容，是提及和反复阐发了‘沉郁’之说。”袁褔正先生提出：“‘沉郁’境界由两个基本方面构成，是显而易见的：一是词人的遭遇和思想感情，……一是词人的遭遇和思想感情赖以表现的艺术，……前者是思想内容问题，要见‘性情之厚’；后者是艺术形式问题，要见‘体格之高’。正是这种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构成‘沉郁’的境界。陈氏论词强调‘沉郁’之根底深，须学变风和楚辞，由此也可看出，他提倡的‘沉郁’，是根源于内容而表现于形式的。”孙维城^{〔8〕}教授在“论陈廷焯的‘本原’与‘沉郁温厚’”一文中说：“陈廷焯所说的沉郁与含蓄有联系，‘意在笔先，神于言外’，‘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基本是含蓄，也有形神、言意的关系在，……‘沉’指格调之高。他的‘沉则不浮’指‘体格之高’。……‘郁’见‘性情之厚’。‘郁则不薄’，故能见‘性情之厚’”。

袁褔正^{〔4〕}进而说：“陈廷焯重视词婉折含蓄的特点而强调‘沉郁’境界，又是重视文艺创作的特征和规律的表现。文艺创作要求用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缺乏或没有艺术形象

的作品，无论思想内容怎样正确，也是没有力量，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恩格斯指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甚至说：‘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十分通俗而又深刻地揭示了文艺创作的特点和规律，指明了一切具有某种思想倾向的文艺，都须形象化，不能概念化。鲁迅说：‘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这很发人深思。所谓‘诗美’，说到底就是形象。诗一旦脱离形象，不用形象思维，便算不上好诗。词更是如此。陈廷焯的‘沉郁’说，从艺术上看，实际就是形象说。‘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袁又反复强调：“陈廷焯的‘沉郁’，即‘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就是要求执笔写作之前，作家须有成熟的形象思维，将作品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深深寄托在完整的形象之中，取得音在弦外的艺术效果。”袁总结说：“总之，陈氏‘沉郁’词说，是既重内容又重形式，内容和形式有机统一的审美理论，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屈兴国⁽¹⁾先生在其“《白雨斋词话》的‘沈郁’说”一文中指出：“这里要说明的是：一. 陈廷焯所论的沈郁，指词这一独特文学样式所共同具有的最美好的风格；而不是某一时代、作家、作品单独具有的风格。二. 文学作品的风格是根源于内容而表现于形式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浑然不能分割的。”屈并谓：“说明了陈廷焯的沈郁说是建立在兴体艺术之上的，只有运用最好的艺术方法，才能写出具有最高风格的沈郁的词。”屈又曰：“陈廷焯的所谓沈郁说，……以兴体的方法，去形象地反映现实中的重大政治内容和抒写真切感受，实现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具有最美好风格的作品”。

彭玉平⁽⁹⁾教授在其论文“陈廷焯词学渊源论”中云：“陈廷焯的词学核心是‘沉郁’说。”并谓：“沉郁说关乎体格与性情两个方面，体格之高是通过词中寓意来表现的，而性情之厚则是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法来体现的，二者互为表里，构成沉郁说的两大基本内容。……‘沉郁’说是陈氏对词的总体审美规范，而且这种规范是最高的和唯一的，因为‘词则舍沉郁之外更无以为词’。”彭玉平教授又在其发表于《中国韵文学刊》的论文中云：“沉郁顿挫说是《白雨斋词话》的理论核心，《白雨斋词话》引以千端而衷诸一是”。

词学研究者陈水云⁽⁶⁾先生在其论文中指出：“自《白雨斋词话》初出，就以‘沉郁顿挫’的审美见解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沉郁说’也就成了《白雨斋词话》的代名词。”陈水云先生在其文中报道了1998年张宏生⁽¹⁰⁾在《清代词话的建构》中认为：“‘沉郁’是指一种艺术风格，所涉及的内涵并不是纯艺术的。它以深刻的思想性作为出发点，以比兴寄托作为表情达意的形式，以‘欲露不露，反复缠绵’作为沟通主客体的审美体验，‘温柔忠

爱’作为全部创作活动的旨归。所谓‘沉郁’，实际上是对中国古典美学经验的某些重要部分所作的总结和提炼，是陈廷焯通过对词史的探讨，并经过自己的主观提升，对词的创作所提出的一种标准。”张宏生先生又提出：“‘沉郁’的风格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源头，……‘沉郁说’不仅有理论上的阐发，而且还有着门径上的指导。”陈水云先生还报道 1987 年黄保真⁽¹¹⁾先生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中提出：“陈廷焯的思想核心是‘沉郁说’，这是陈廷焯对词的创作提出的指导思想，是陈廷焯从《变风》、《楚辞》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艺术规律。”陈水云报道 1990 年谢海阳先生在“《白雨斋词话》与张惠言论词主张的异同”一文中称：陈廷焯“将作品的内容要求和体格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提出了自己的审美主张——沉郁顿挫说，它将内容与形式、作品与人品、诗学与词学揉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陈水云报道称黄霖⁽¹²⁾先生认为：“陈廷焯‘沉郁说’的理论内涵是：深厚而蕴藉为其外部风貌，哀怨而忠厚为其内在精神，以变风和楚骚为其艺术典范。”陈水云又报道 1993 年谢桃坊⁽¹³⁾在《中国词学史》中分析《白雨斋词话》认为：“陈廷焯的论词意见里渗透着深沉的忧患意识，这是因为以沉郁论词，在晚清特定的条件下，能够激发人们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改变人们的‘词为艳科’的观念，真正起到尊体的作用。以‘沉郁’论词，能将思想性和艺术结合起来，既强调主体的思想品格和作品的内容，也要求相应的含蓄的寄意的深厚的表现方式，因而在理论上摆脱了二元的困境”。

彭玉平⁽¹⁴⁾教授在其论文中云：“陈廷焯以《白雨斋词话》而蜚声近代词坛，人皆知其沉郁顿挫说。”彭在论文中又谓：“一部《白雨斋词话》，也正是沉郁说光彩灼灼的漫衍与幅射”。

孙维城⁽⁵⁾教授在其著作中谓：陈廷焯“确定了自己论词的史学标准，与已经确定的论词的美学标准‘沉郁’相结合（史论结合），完成了词学理论的建构。”孙又云：“陈氏发现史位存词的稍得正声，嗣响风骚，而接近沈郁，……使得一部词史既有重点词家之显，又有稍次词家的灰线之隐，显隐结合，血脉贯通，可以流通千年”。

（三）《白雨斋词话》论诗与词的关系

陈廷焯在“词话”中阐释了词学与诗学的关系，揭示和提出了诗词同为一本，同体异用，必先工诗而后入词的论述。陈氏在其《词坛丛话》^(1, 7)始页写道：“唐以前无词名。然词之源，肇于赓歌，成于乐府；汉《郊祀歌》、《短箫铙歌》诸篇，长短句不一，是词之祖也。”陈氏又在其“云韶集序”中提出：“《康衢》、《击壤》，诗之先声，而词之原也。”在“词话”中，陈氏曰：“《风》、《骚》为诗词之源。”对于诗词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区别，陈氏

阐释：“温厚和平，诗词一本也。然为诗者，既得其本，而措词则以平远雍穆为正，沉郁顿挫为变。特变而不失其正，即于平远雍穆中，亦不可无沉郁顿挫也。词则以温厚和平为本，而措语即以沉郁顿挫为正，更不必以平远雍穆为贵。诗与词同体异用者在此。”所以，陈氏说：“诗有诗境，词有词境，诗词一理也。”陈氏又称：“诗词一理，然不工词者可以工诗，不工诗者断不能工词。故学词贵在能诗之后，若于诗未有立足处，遽欲学词吾未见有合者。古人词胜于诗则有之，未有不知诗而第工词者”。

彭玉平教授在其“导读”^[2]中指出：“诗与词是陈廷焯致力两个重要领域，他认为诗与词实际上是同体异用的关系，本源一致，但表现各异。诗不仅是词的源头，而且也是学词的基础。”彭又说：“陈廷焯倡导的创作途径是由诗以入词，从《骚坛精选录》与《白雨斋词话》的对勘中，我们可以发现有许多类似或可以互证的地方，特别是在对于‘沉郁’在诗词中的不同地位和表现形态，两本的观点十分接近。”彭认为：陈廷焯“关于诗、词文体性的转变，”可由陈氏《骚坛精选录》选录和评论“隋代侯夫人《看梅》诗……揭示出从诗到词的渐变轨迹。”彭还认为：陈氏“很可能他的学术理念是在诗歌中渐趋成熟以后，再移之于论词的，则《骚坛精选录》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就更显珍贵了。”彭云：陈氏“力辨其在诗词体性和表现形态方面‘同体异用’的关系，体现了其诗学与词学之间的紧密关系和彼此区别，构建了相当完整的诗学和词学体系，在理论发达但理论形态相对涣散的晚清，颇具理论疏凿手段，已肇新诗学和新词学理论体系之端倪。”彭玉平教授称：陈氏“形成自成一格的理论格局，……建构了相当完整的诗学与词学的理论体系。”又谓：“陈廷焯的文学思想，不仅是传统文学创作的一个总结，对晚清的诗词创作和诗词理论，也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引导意义”。

林玖仪^[3]研究员在其“考论”一文中说：“《白雨斋词存》及《白雨斋诗钞》乃是研究陈氏生平之重要资料，亦为探讨其词论之重要佐证。……陈廷焯《词话》中引录已作，原意在佐证其理论，故稿本中诸作分散于各条中，亦不易见出诗词集原貌。是以笔者董（一意正）理其文本，以广为流传。”词学研究者孙维城^[5]教授谓：“陈氏有其自身的诗词文学核心，有其自身构建的诗词文学体系，有其符合历史以至文学史发展实际的、进步的文史学观和正变观，有其严密的史论结合的词史观，而撰写出具有以上特点的代表作《白雨斋词话》”。

（四）《白雨斋词话》论词要览

陈廷焯在其“词话”中对历代词学和诗古文辞，作出了历史而客观的评论，评论亦颇中肯，堪为经典之作。上世纪30年代，《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提出^[6]：陈廷焯“对

历代词选词话得失的评价亦多中肯之言”。《续修四库全书白雨斋词话提要》也称：陈廷焯“论词范围之广，当推是书矣。闲评选本词话之得失，亦多中肯之言。”林玖仪^[3]也认为：《白雨斋词话》“……所论多能深中肯綮。”陈水云^[6]先生在其论文中报道：“1949年，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其《清代文学批评史》中论及《白雨斋词话》，认为该书‘对自唐五代以迄清朝的历代词人详加评论，有不少值得倾听的意见’。”陈水云又报道黄保真^[11]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中认为：“陈廷焯视野广大，见解闳通，能破除门户之见，分清艺术是非，进行客观的历史批评。”陈水云还报道谢桃坊认为：“陈廷焯以‘沉郁’论词，比清代其他许多词学家，更有理论深度和理论的统一性，在具体评论作家作品时，都很有说服力，使人们可以感受到评论者所特具的时代意识”。

屈兴国^[1]先生阐述陈廷焯对诗古文词评论时说：“如果只写物而没有寓意，只写景而没有寓情，这都是陈廷焯极力反对的所谓词中‘变格’然而，并非凡属托物言志的诗词皆合于比兴。”屈兴国先生对陈氏的一些诗评说：陈氏“特地举了《随园诗话》等书中所载的数首咏物诗为例，前三首‘恶薄浅露，情不正’；后二首‘兴会佳句，情不深’。前三者冷嘲热讽，等诸骂詈，性情不厚；后二者写富贵福泽，‘乐则浅显’。”屈曰：陈氏“以为这些诗都不合于‘情以郁而后深，词以婉而善讽’的要求。这就可以看出，陈廷焯的所谓比兴，不是我们所熟说的写作技巧，而是包含着作家一定的思想倾向和形象塑造特点的艺术方法。”兴国先生又说：“陈廷焯认为：一首好词，既要‘情景逼真’。又要‘情理两融’，也就是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这就有赖于作家对生活的本质的认识 and 正确的世界观的指导。所以陈氏说：‘无论诗古文词，推到极处，总以一诚为主’。诚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诚实，作者要情真，……有真性情才能写出真实而感人的词。另一是诚正，作家应‘情得其正’，不能‘思涉于邪’，不以正确的思想指导创作，‘有失风人之旨’，形象就会不真实。”屈又曰：陈氏要求“使形象的具体可感性和思想倾向性有机地结合。他于是对作家提出要求说：‘作词气体要温厚，而血脉贵贯通，血脉要贯通，而发挥忌刻露。居心忠厚，托体高浑，雅而不腐，逸而不流，可以为词矣。’也就是认为，这样塑造出来的形象，才会有血有肉，丰满充实，达到‘深情绵邈，意余于言’。”兴国先生又谓：陈氏“他以‘意在笔先，神余言外’两句话，概括了文学创作从构思到完成以至读者再创造的全过程的主要特征”。

屈在其论文中又称：“作为沈郁说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是陈廷焯强调‘性情之厚’，即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从读者来说，应该知人论世，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评价作品；对作者来说，又要求他们写出‘意有所寓，旨有所归，语无泛设’，表现家国身世之感的有

现实意义和真实内容的作品，‘非徒吟赏风月以自蔽惑’，这些都是很正确的。不仅如此，陈氏更进一步提出了词应该去大力反映当前的现实，表现作家身经目睹的重大事件。其评姜白石云：‘南渡以后，国势日非，白石目击心伤，多于词中寄慨。……感慨时事，发为诗歌，便已力据上游。’这就是说，文学的任务，不能是为了记录史实，而必须是为了战斗。基于这一认识，陈廷焯对于那些富有爱国思想的，反映现实重大事件的题材的作品，即使不是名家，甚至艺术上也有缺陷的，他都予以热情的赞美。象南宋末年，国有外患内忧，各种矛盾尖锐，（陈氏曰：）‘苟有人心者，未有不拔剑斫地也’。”屈进而举例称：陈氏“誉为‘词中之龙’的辛（辛弃疾）词，固然揭响入云，还有赵鼎、张仲宗等一大批不太知名的作家，他们抨击权奸误国，要求抗战，以突出的主题，组成了悲歌慷慨豪放激越的交响乐章。所以陈廷焯说：‘此类皆慷慨激烈，发欲上指，词境虽不高，然足以使懦夫有立志。’换言之，文学作品不仅应当帮助人们认识生活，而且应当鼓舞斗志，激励人们去行动”。

陈廷焯对民间歌谣杂曲，十分重视。早在陈氏撰写《云韶集》时，他在《词坛丛话》首段中就写明：“兹将汉、晋、六朝诸歌曲，择其类于词者若干首，录入杂体一卷，亦数曲不忘祖之义云。”所录歌曲达一百六十首之多，所以屈也说：陈氏所著“《云韶集》中收录有民歌。”陈氏在他的《词坛丛话》中又说：“山歌樵唱，里谚童谣，竟有妙绝千古者。”屈兴国也报道陈氏在《云韶集》中说：“山歌樵唱，酒令道情，以及传奇杂曲，言虽俚俗，而令读者善心感发，欲泣欲歌。”屈兴国在其“从《云韶集》到《白雨斋词话》”一文中也说：陈廷焯“对俗文学的艺术感染力是有认识的。对于具体的作品，他也有自己的看法。如评广西少数民族歌谣狼歌云：‘其歌或二三句，或十余句，长短不一，俱足与古乐府相表里’。”屈认为：陈廷焯“他还以评词手法评山歌，说广西刘三妹的《妹相思曲》：‘音节凄惋，兴而比也。’《吴船山歌》：‘音节凄清，声调悲惋，闻之令人动羁旅之感，尤为千年绝唱。’体现陈氏对俗文学的正确见解，而其所选录，也为后人保存了一部分珍贵的俗文学资料。”这些都是陈廷焯赞扬和重视民间歌谣、民俗文学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陈廷焯作为一位诗词学的评论家，既重视民间歌谣，又同时看到其中的不足之处。当然，不能把民间歌谣与成熟的、经典的大雅之作等同起来，相提并论；何况“山歌樵唱，里谚童谣”，各自表达的内容不同，格局也有较大差异，陈氏并不废弃，将其编为“杂体”一卷，可使编目分类清晰；对“山歌樵唱，里谚童谣”中的不足或俚俗之处，理当去其“芜杂”，来一番去伪存真，予以提高或归雅。所以陈氏在其“词话”中又谓：“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是在有识者。”陈廷焯说：“山歌樵唱，里谚童谣，非无可采，但总不免俚俗二字，难登大

雅之堂。好奇之士，每偏爱此种，以为转近于古，此亦魔道矣。《风》、《骚》自有门户，任人取法不尽，何必转求于村夫牧竖中哉？”这正是陈氏针对一些作家对待“山歌樵唱，里谚童谣”不去作去其“芜杂”，加以提高的工作，却偏爱以猎奇的心态，总认为他们的猎奇就“以为转近于古”，就等同于大雅之作，就可与大雅之作相提并论，并驾齐驱。这当然是步入歧途，“亦魔道矣”，理当予以指正。陈氏接着又指出：“《风》、《骚》自有门户，任人取法不尽，”说明作为一个作家，既可自有门户，又能有“根柢于《风》、《骚》”的基础理论，尽可结合自己的感悟，运用不同手法，下一番功夫，完全可以撰写出可歌可泣的大雅之作；也可以对民俗歌谣，去除“芜杂”，予以提高；又何必舍此而独抱猎奇的心态，“转求于村夫牧竖中哉？”而不求进取呢！

其实，不仅是“山歌樵唱，里谚童谣”，即使是历代作家的诗词，也杂有“俚俗”，也同样有难登大雅之堂的作品，也理应去除“芜杂”，才可获得提高。陈氏在“词话”中云：“今人论词，不向《风》、《骚》中求门径，徒取一二聪明语，叹为工绝，正坐此病。”陈氏又称：“学古人词，贵得其本原，舍本求末，终无是处。”说明那种不能体味优秀词作的风骚本原，而一味模仿的词作或犹抱猎奇心态，终难登大雅之堂。陈氏提倡：“读古人词，贵取其精华，遗其糟粕。”陈氏进而曰：“成肇磨《唐五代词选》删削俚褻之辞，归于雅正，最为善本。”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赵晓辉^[15]在她的“从选本批评看陈廷焯的词选思想”一文中说道：“陈氏主张择词必严，其根源何在？由词史观之，实因（陈氏曰：）‘北宋有俚词，南宋多游词，而伉词则两宋皆不免，选词不可不慎。’在宋代，因词具有娱乐和交际的社会文化功能，故花间尊前的应歌之作、调笑俳谐的俚俗之词和应酬祝寿的无谓游词等等，俯拾即是，蔚为大观。而清人选词则多以骚雅为目，故择证时自不免将所谓‘俚词’、‘游词’、‘伉词’悉数滤去，使归雅正。”赵晓辉在文中又称：“陈氏主张择词必严”，她说：“在陈氏看来，‘总集传人传词则可，若要示人津梁，明学词之法，则赖选本之力。选词贵精不贵多，精则有所专注，多则无所适从。’……故陈氏认为一个好的选本对于学词者至关重要，选词务在于删汰芜杂，使精华毕出”。

李锐先生在其“陈廷焯词论研究”一文中称：陈氏“所谓的雅是和沉郁有所联系的，这里的雅强调词要有真情，认为只有‘意’和‘雅’有机结合才是最重要的，（陈氏曰：）‘遣词雅而用意浑，其品乃高，其气乃静，’这种沉郁的雅所追求的就是沉郁的内容、顿挫的表现方式和比兴寄托的意蕴三者的和谐结合，这既尊重了情的需要，又没有抛弃词的社会功用”。

陈廷焯在“词话”及其“别调集序”中均谓：“人情不能无所寄，而又不能使天下同出一途。大雅不多见，而繁声于是乎作矣。……外此则啸傲风月，歌咏江山，规模物类，情有感而不深，义有托而不理。直抒所事，而比兴之义忘；侈陈调其盛，而怨慕之情失。辞极其工，意即其巧，而不可语于大雅，而亦不能尽废也。录《别调集》。”说明陈廷焯论词既有其严谨的要求，又有其客观而重视现实的一面，也和他对待民间歌谣俗文学一样，显示出他那种不弃不废的精神风格。李锐先生在其文中也论述称：这是“陈廷焯兼容并包、不废别调的思想”。

陈氏在其“词话”中提出：“学者贵求其本原所在，门户之见自消，否则各执一是，互相攻诋，溯厥本原，卒无托足处，宜乎不得其通也。”陈氏提倡致力于“求其本原”，要求在求其本原中自消门户之见，共求词学之真谛与发展，反映了他境界之博大。

陈廷焯论词，还要求去开拓词艺的新境界。陈水云报道 1985 年王运熙⁽¹⁶⁾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中说：“《白雨斋词话》在论‘沉郁’的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方面有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还敢向汉儒和宋儒大师提出不同意见，表现出一定的解放精神，……在历论各代词论之后，表示不以他们所达到的境界为极限，勉励后来作者努力开拓词艺新境，眼光是比较远大的”。

赵晓辉⁽¹⁵⁾说：“正因为陈氏致力于用词选来传达一己之词学理念，其于词选之道又多知其甘苦，察其路数，故其于选词论词皆有卓见，不拾人牙慧。其有云：‘作词难，选词尤难。以我之才思，发我之性情，犹易也。以我之性情，通古人之性情，则非易矣’。”赵晓辉指出：陈廷焯的评词思想“直到今天，对于我们编辑和评价词选，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赵晓辉^(15, 17)在其“从选本批评看陈廷焯词选思想”及“陈廷焯词选思想探析”论文中均提出：“清人在对前代词选的审视、查省当中，形成诸多极富价值的论见，后来将此发扬蹈厉，用力颇勤者，当属晚清词论家陈廷焯。……陈廷焯对词选择编辑实践，贯穿了其词学活动的始终，这本身就构成了其词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不惟如此，与前代词评家对于词选灵光片语的评论相比，陈氏对历代词选还形成了一套自具手眼、颇为系统的看法。”她又强调：“陈氏在编辑词选的实践中，在对各家选本的评论中，以及词选对学词者的重要性等方面，都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而系统的理论看法，……陈氏在词选总体上是较为严谨的，其议发前人之所未发，多有可采之处，堪称圭臬”。

屈兴国⁽¹⁾提出：“陈廷焯在重视作品的内容，号召作家表现重大题材的同时，特别强

调作家的‘性情之厚’。”屈指出：陈氏所说的“‘人心不能无所感，有感不能无所寄。寄托不厚，感人不深；厚而不郁，感其所感，不能感其所不感。’显然，这些议论都是强调作家思想感情对作品内容的重要意义和作品增强艺术感染力的巨大作用的”。

（五）《白雨斋词话》堪称一部传世词史学

《白雨斋词话》也是一部词学史的著作，且为唯一的一部传世之作。陈廷焯撰《词坛丛话》首行言：“然词之源，肇于赓歌”。《白雨斋词话》作为一部词史学，陈氏在“词话”首句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词兴于唐，盛于宋，衰于元，亡于明，而再振于我国初，大畅厥旨于乾、嘉以还也。”洒洒三十字，已将词学的发生、发展、兴衰的历史过程，提纲挈领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孙维城教授曰：“这是合理完整的词发展演变观的概括”。

上世纪 30 年代，《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中已经提出：《白雨斋词话》“可当一部词史。”资深教授唐圭璋先生为“词话”十卷影印本作序曰：“上下千年，尽收笔底，……”，自然包含了陈氏对词学的兴衰与演变发展的历史时期的评述。孙维城⁽⁵⁾教授在其著作中称：“《白雨斋词话》由于目的明确，所以处处关注重要词家，关注词学的一些转折关头与转折人物，从而勾勒出唐宋词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其后清词的发展演变的清晰的轨迹。”孙维城曰：陈氏“以史论结合的方式，论述了唐宋词史与金元明清词史。他的词史以沉郁理论为核心、为圭臬，一以贯之，显出史论结合的严密性。”孙维城教授又称：《白雨斋词话》“是一部史论结合的词学著作。陈廷焯的词史观念及词史建构，开启了近现代的词史撰写，此后的词学家写作词史，都不能离开《白雨斋词话》。陈廷焯词学史的贡献，不仅在于理论，而且在于他的词史观念及词史建构，这一点还没有为学术界所充分认识。”孙维城进而称：“只有陈廷焯撰写出一部词史，为传统社会唯一一部词史，且规模宏大，结构分明，以理论‘沉郁’为经线，而以词的发展为纬线，勾勒了一部波浪起伏、观点鲜明的词的发展史，是弥足珍贵的。”孙维城教授重复强调：“只有陈廷焯有明确的构建词史的意识，并以词史观与词论观相结合，形成严密的史论结合的词史观，为传统社会撰写出唯一一部传世词史”。

（六）《白雨斋词话》的重要价值

《白雨斋词话》所阐释的陈氏对历代诗古文词的评论、陈氏的诗词文学的思想理论以及词史学的论述，不仅丰富了我国诗词文学宝库，而且在促进诗词文学理论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具有重要的价值。屈兴国⁽¹⁾先生在其“《白雨斋词话》的‘沈郁’说”一文称：“他总结了前人艺术实践的经验，在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方面，说出了不少深刻的意见，不仅超越前人，对于今人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屈兴国先生又云：“《白雨斋词话》在发

扬前人词派的基础上，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独辟蹊径，标新立异，丰富了古代文学宝库，有益于今人的批评借鉴，从而在文学发展史上占有较重要地位”。

彭玉平^[9]教授在其“陈廷焯词学渊源论”中称：“陈廷焯的词学渊源是丰厚的，他广泛吸取营养，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彭谓：“对陈氏来说，不是一种简单的承袭，机械的组合，而是熔铸了自己的创作经验和审美趣味，这种熔铸在经过与同道论辩切磋之后，益发趋于稳固。因而陈氏词学思想的扭转，既有时代与环境的召唤，也有他自身审美观念的潜移默化，这是应该引起我们同等注意的。”彭又曰：陈廷焯的“‘词话’时序最早，涉猎范围最广，篇幅最富，在以核心范畴为主，持以批评词史，总结理论方面都堪称是导夫先路之作”。

孙维城教授在其著作^[5]中云：“他的《白雨斋词话》悬鹄甚大。”孙说：陈廷焯“撰写‘词话’而视‘经国大业’，这是他‘词话’悬鹄甚高的原因。”孙维城教授称：“可贵的是陈氏的词史观是通变的，他既有继承，有复古；又有变古，有发展，是符合历史以至文学史的发展实际的，是进步的史学观，与今天的史学观是接近的。”孙进而指出：“他的正变观倾向还在于变化，不是食古不化，而是强调后代的变化，可见他的正变观是多么正确！”孙又谓：“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不同于其他词学著作的地方，还在于他的词学发展演变史观，还没有哪一部词话这样致力于构建一部词学发展演变史”。

上海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严寿澂^[18]先生在“《白雨斋词话》‘沈郁’说述论”一文中称：“亦峰‘沈郁’之说，仍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陈水云报道黄保真^[11]分析《白雨斋词话》的理论内涵称：“陈廷焯对词作出了更高的理论概括，……而且要求词表现人们对时代盛衰、境遇穷通的感受，较正确地认识到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袁睿正^[4]先生在其论文中说：《白雨斋词话》“是历代词话中篇幅最大的一种，涉及面广。”林玫仪^[3]在其论文中提出：《白雨斋词话》“向来被视为阐扬理论之一大巨著，于词学理论史上影响极大”。

四、 陈廷焯（1853—1892）的生平

陈廷焯一生以读书、著述、授徒为业。毕生致力诗词，笃志古文，以词学评论、诗词学理论、词史学著称。

（一） 陈廷焯为人表里洞然，敦品行，质直正义

《丹徒县志摭馀·儒林文苑》以及《续丹徒县志·文苑》等记载：“陈廷焯与人交，表里洞然，性磊落，敦品行，素有抱负，尤能豪饮。尝念朝政不纲，间论时事时，辄义动于色，

甚至中宵不寐。”县志还记载：陈廷焯“性磊落，有豪侠气，……其敦尚气节”。陈氏考举人时的座师汪懋琨为《白雨斋词话》作序时回忆曰：“闺中得生卷，议论英伟，而真意恳挚，决其为宅心纯正之士。亟荐于主司，果膺魁选。谒予于桃源署斋，温文尔雅。与谈经史，悉能根究义理，贯穿本源。诗古文辞，皆取法乎上，必思登峰造极而后止。间论时事，因及古忠臣孝子，辄义动于色。予窃喜鉴衡不爽，而生之素所蓄积矣”。

《续丹徒县志》记载：陈廷焯“己丑（1889）年赴礼闱试罢，归经山东，途中闻某妇哭声哀，询悉其夫浙江人，棺久停，无力归殡，廷焯慨然赠资，雇舟伴回。有侠某伺旁密侦之数日，见廷焯举止不苟，惊异，始吐实情以谢之”。

上述县志记载：陈廷焯“中年潜心医理，颇能济人”。陈廷焯潜心医理，乐为邻里问医求药而不收受，力求经世济时之蕴，深受邻里信任和尊敬。

彭玉平⁽²⁾教授在《白雨斋词话》“导读”中考证曰：“陈氏一生交游广。居丹徒时，曾过镇江，在焦山松寥阁有题壁。寓居泰州时，到过靖江、宜陵等地，集中并有记游之作。己丑（1889）年为赴礼闱试，去过北方，途经山东等地。迁居浙江黄岩时，途经南京、杭州等地。早年也曾南下广东等地。陈氏所到之处，广交学友，切磋学问，尽览当地名胜”。“集中并有记游之作”。

（二）陈廷焯为学严谨

陈廷焯的著作林立，遗书委积，但大都均未彻编付梓。他对著述、诗词、文学要求严谨；且对诗词文学的研究与时俱进。他与其姨表叔庄械在丙子（1876）年相遇后，切磋学问，审视自己的作品，他在《白雨斋词话》中说：“旧作一概付丙（焚毁），所存不过己卯（1879年）后数十阙，大旨归于忠厚，不敢有背《风》、《骚》之旨。过此以往，精益求精”。他在“词话”中对1874年自己撰写的《云韶集》，则称：“自今观之，殊病芜杂，然其中议论，亦有一二可取者。”可是他并未付梓。《白雨斋词话》撰就后，其受业门人甥包荣翰为“词话”木刻本作跋曰：“荣请付梓以公诸世，舅氏不许，谓余是编历数十寒暑，识与年进，稿凡五易，安知将来不更有进于此者乎？”这种为学严谨的态度，堪为后人楷模。彭玉平教授⁽²⁾称：“陈廷焯治学精苦，对经史根究其理，贯穿本源，对诗文取法乎上，标格甚高”。

（三）陈廷焯为业勤奋

《续丹徒县志·文苑》等地方志记述：“陈廷焯天资颖异，博览群书，尤致力诗词，温柔敦厚，上溯《风》、《骚》，时论推服”。王耕心为“词话”作序称：“吾友陈君亦峰，少为诗歌，一以少陵杜氏为宗，杜以外不屑道也。年几三十，复好为词，探索既久，豁然大

彻。所为言藁，深永超拔，已足上摩宋贤之垒。而著《白雨斋词话》八卷，抉择幽微，辨才无碍，尤有不受流俗羁绁者。亦峰之于词，思与学兼尽如此，亦勤矣哉。”包荣翰为《白雨斋词话》作跋称：“舅氏于书无所不览，凡习一艺必造深微，而于词学尤为深且邃。所著《词话》八卷，一本温柔敦厚，以上溯《国风》、《离骚》之旨，可谓发前人之未发，俾后学奉为圭臬，卓卓乎词学之正宗矣。”

陈氏在旅行时，从不忘著述。如《云韶集》自序，是陈氏在“同治十三年（1887）秋八月仲浣（中旬）”“笔录于天台客舍”；丹徒陈廷焯亦峰著《白雨斋诗钞》刊载：“宿松寥阁”、“九日登焦山观音阁”；“词话”与“诗钞”中记载的“路过靖江，怀亡友王竹庵”、复赋二律“过王竹庵墓、是夜宿宜陵二首”等诗篇都是在旅途中撰写的。在其“诗钞”中还刊有他“九月二十四日题焦山松寥阁左壁”的七言律诗。陈氏在患病辞世的当年，仍在孜孜不倦地写作，《白雨斋词话》自序完成于“光绪十七年除夕日亦峰陈廷焯序”，即1892年1月29日。彭玉平教授称：“陈氏一生著述较富，其弟子包荣翰说他‘著作林立’，王耕心也言及陈氏去世后‘遗书委积，多未彻编’，可惜大都散佚”。彭玉平又曰：“《白雨斋词话》是陈氏后期重要的著作，体现了其词学的最高成就”。

（四）陈廷焯建树良多，使天假其年，必有更大成就

陈廷焯对诗古文词的研究，正趋于如日中天之际，晚清国衰民穷，陈氏家道中落，陈廷焯不能专心于诗古文词的研究。王耕心为“词话”作序曰：亦峰“退省其家，父兄之劳，靡不肩任，宗族之困，莫不引以为己忧”；该序又曰：“亦峰为学精苦，每昼营家务，夜诵方策”。陈廷焯也有诗云：“长夜不寐万感集，……穷年矻矻非吾志”。可见，陈廷焯十分操劳和辛苦。之后他不幸遇病，在泰州溘然长逝，享年40岁。

陈廷焯仙逝后，王耕心为“词话”作序云：“亦峰遽以光绪壬辰（1892年）秋奄忽辞世。噫！善人君子，不能久存于世，欧阳子所以致慨于张子野者，予尝以为伪言，今乃不幸，于吾亦峰亲见之，宁无洞耶！……及既歿，遗书委积，多未彻编。惟手录《词话》，已有定藁，其门下士海宁许君守之诸君子将为刊行，以予庶几能知亦峰者，督文弁首。予既感亦峰之志，且幸是书之传也。……惟托文字者可以无穷，亦峰所以自托者既著，其亦可以无憾矣乎？记三年前，亦峰尝挈是书初藁见视，且属为叙，予以方如南清河，俶装待发，无以应也。今乃终得论次其书，而亦峰已不及见。呜呼！此足以启予之悲也已！”寄托了对亦峰深切的哀思。包荣翰为“词话”作跋曰：“呜呼！壬辰岁舅氏遽归道山，荣惧是编久而散佚，亟与同学诸子，刊而传之，呜呼，舅氏天资卓越，丰于才而啬于年，著作林立，是编特其绪余。荣愧不

获卒业以底于成，而不能忘谆谆耳提面命时也。悲乎！”受业门人许正诗为“词话”作跋云：

“呜呼，此虽不足传先生，要亦可为诸编之嚆矢。先生有知，慰耶，悲耶？刊既成，敬疏其缘起如右。盖泣然不知涕泗之何从矣。”都充分反映了对先师陈廷焯的敬仰、缅怀和师生之情笃深。

百余年后的今天，《白雨斋词话》的研究者们，对陈廷焯的仙逝，都深感惋惜。2003 年，陈水云^{〔6〕}先生报道，1993 年，黄霖^{〔12〕}先生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中说：“综观廷焯一生，在词学方面抱负甚大，用力亦勤，孜孜以求，建树良多，使天假其年，必可取得更大的成就”。

斯人已去，遗著犹存，绵延百余年，已列为“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弥足珍贵；“词话”已蜚声词坛，名震遐迩，是我国诗词文学理论宝库中一颗耀眼的璀璨瑰宝，熠熠生辉，光彩照人，与世长存。

致谢

本文蒙陈光裕、陈光远审阅，陈光裕斧正和为本文命题，乐汶提供有关论文复印件，特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 〔1〕 屈兴国：《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下册，齐鲁书社 1983 年出版。
- 〔2〕 彭玉平：《白雨斋词话》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出版。
- 〔3〕 林玖仪：中国韵文学刊，2009，23（2）：64-72。
- 〔4〕 袁褰正：西北大学学报，1981，（2）：72-79。
- 〔5〕 孙维城：《千年词史待平章》下编，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0 年出版。
- 〔6〕 陈水云：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3，23（1）：41-47。
- 〔7〕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中华书局 1986 年出版。
- 〔8〕 孙维城：安徽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7（11）：16-20。
- 〔9〕 彭玉平：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1，19（4）：466-470。
- 〔10〕 张宏生：《清代词学建构》，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 〔11〕 黄保真：《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 (12) 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
- (13) 谢桃坊等:《中国词学史》,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出版。
- (14) 彭玉平:中国韵文学刊,1994,(2):77-82。
- (15) 赵晓辉: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22(1):52-55。
- (16) 王运熙:《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
- (17) 赵晓辉: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0(6):73-76。
- (18) 严寿澂:中华文史论丛,(总第八十辑):360-393。

后叙

陈光裕、陈光远和我彼此或在宁、或在苏州、或在沪相会时,或书信来往时,总不免会论及我们的祖父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等遗著;会怀念曾祖父陈铁峰在祖父逝世后及时率祖父的受业门人将《白雨斋词话》付梓问世,使天壤孤本未遭湮没,而得以传播与发扬。

光裕、光远和我以及诸弟攻读和从事的专业均属自然科学,诗词文学的知识浅薄,对“词话”理解乏力,深感愧对祖父在天之灵。

祖父于十九世纪末尾的壬辰年(1892)英年遇病辞世,我等孙辈自然皆无从与之相见,但是,从其著作“词话”中、从文献刊载祖父的为人、治学、从业的记述中,却似犹如相见。

步入二十一世纪的首个壬辰龙年(2012),已是祖父诞辰第一百六十年了,也恰逢他逝世整整一百二十周年。故将退休后习读祖父“词话”和学界研究该“词话”的论文的心得笔记整理成文,作为我们陈氏后人对祖父诞辰第一百六十年和祖父逝世一百二十周年的纪念。

陈 昌

二〇一二年二月于上海